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天主教文献

张云  马义德

**提要：**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有三百余部汉籍，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为天主教文献，成为馆藏汉籍的重要特色。本文首先介绍98部天主教文献的基本信息，然后从中选择海内外稀见书《天学集解》《乐法启蒙》《熙朝定案》《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五种，详细介绍。俄汉学家卡缅斯基是俄国图所藏天主教文献重要捐赠者，他搜集的很多藏品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关键字：**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天主教文献  域外汉籍

坐落于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以下简称“俄国图”）是俄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图书馆，拥有丰富而珍稀的图书资源，同时也是俄罗斯收藏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机构之一。1993年，康·雅洪托夫编写了《公共图书馆中文抄本和木刻本目录》（以下简称“目录”）[1]，详实地著录了俄国图手稿部与亚非国家文献部所藏的包括传统汉籍、舆图、碑帖、信札、图画等内容在内的共364号文献，成为我们了解该馆所藏中国文献的一把钥匙。笔者在圣彼得堡调查汉籍期间，根据《目录》指引，查阅了书中所载的绝大数汉籍，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文献是该馆所藏中国文献的重要特点，其中不乏稀见之本。现据所见，略述于下：

**一、俄国图所藏的天主教文献概述**

雅洪托夫《目录》分类中，基督教是其中一大类，其下又设十个二级类目，分别为：（1）宗教常识问题的作品；（2）圣经（包括新经、旧经）；（3）传记；（4）教义问答；（5）祈祷书；（6）赞美诗；（7）规矩、仪式；（8）基督教书书目；（9）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关系；（10）景教碑。有些二级类目根据内容又可以分为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类。据笔者统计，这些书集中在《目录》的第138号至222号，共85号87部书。除此之外，《目录》其他类别中尚有属于西方传教士编制的圣诗乐理书1部，地理类著作5（部）幅，天文学著作4部，数学著作1部，植物学著作1部，报刊1份，以及涉及基督信仰的信札、教徒行为簿等文献。这些文献的基本情况如下（以基督教类下的87部书与其他书目为顺序，信札等除外）：1.万物真原不分卷，清皇城首善堂重刻本。2.万物真原不分卷，清抄本。3.教要序论不分卷，清刻本。4.巴礼哆妈氏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不分卷，1607年菲律宾刻本。5.真道自证四卷（残），清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6.真道自证（残），清刻本。7.哀矜行诠三卷，抄本。8.超性俚唫序一卷，清抄本。9.拯世略说自叙一卷，清抄本。10.圣思语录、小引、俗解一卷，清抄本。11.醒世迷编二卷，清抄本。12.轻世金书四卷，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京都圣若瑟堂藏版。13.轻世金书四卷，同上。14.熟学圣理略论一卷，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15.往金山要诀一卷，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16.真道入门一卷，清咸丰六年（1856）香港英华书院印本。17.福世津梁一卷，清刻本。18.新刊福世津梁一卷，清咸丰三年（1853）刻本。19.圣史之会四卷，清刻本。20.圣会大学十二卷，清咸丰元年（1851）香港英华书院印本。21.善终志传一卷，清咸丰六年（1856）香港英华书院印本。22.东教宗鉴一卷，清咸丰十年（1860）印本。23—29.新诏遗书八卷，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其中有一部残。30.新遗诏书八卷，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31.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八卷，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32.新遗诏书（残），同31。33.新遗诏书（残），清抄本。34.圣经新遗诏全书二十七卷，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35.新约旧约全书节录二卷，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36.旧约全书八卷，清咸丰十年（1860）香港英华书院印本。37.新约全书五卷，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38.新约全书五卷，清咸丰二年（1852）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本。39.新约全书五卷，同38。40.新约全书不分卷，清同治三年（1864）香港英华书院印本。41.新约全书不分卷，同上。42.耶稣基督救世主新约全书五卷，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43.实迹录传三卷，清咸丰十一年（1861）刻本。44.实迹录传三卷，同上。45.圣徒玛窦纪的万日略二卷，清抄本。46.新圣诏圣经不分卷，清同治三年（1864）刻本。47.圣经直解十四卷，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京都始胎大教堂藏版。48.圣书劝言一卷，清刻本。49.圣经之史十二卷，清刻本。50.圣经之史二卷，清刻本。51.圣经析义不分卷，清同治四年（1865）刻本。52.圣史提要，清咸丰十年（1860）刻本。53.圣史提要，同上。54.圣年广益十二编，清乾隆三年（1738）刻本。55.约瑟纪略五回，清咸丰六年（1856）刻本。56.天神会课一卷，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57.圣教要理国语一卷，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58.幼学浅解问答一卷，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59.天神会课一卷，大神父乙阿钦特刻本。60.天神会课一卷，同59。61.圣教理问答一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京东教宗北馆印本。62.教理问答二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活字铅印本。63.圣教日课三卷续一卷，清乾隆间刻本。64.圣教日课，清乾隆间刻本。65.圣教日课（残），清刻本。66.总牍撮要二卷，清康熙七年（1668）刻本，玫瑰堂藏版。67.祝册文一卷，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68.早晚课一卷，清咸丰十年（1860）刻本。69.早课经一卷，清抄本。70.圣体血礼仪提要诵第三六，抄本。71.宗主诗章一卷，清咸丰五年（1855）香港英华书院印本。72.圣咏经一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本。73.圣母圣衣会恩谕一卷，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74.圣母圣衣会恩谕一卷，同上。75.涤罪正规四卷，清末刻本。76.圣母七苦会规一卷，清刻本。77.领洗文一卷，清刻本。78.神功四要一卷，清咸丰十年（1860）刻本。79.备领圣体规程一卷，清咸丰十年（1860）刻本。80.备领圣体规程一卷，同上。81.教子文一卷，清刻本。82.天学集解九卷，清抄本。83.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一卷，清抄本。84.熙朝特典一卷，清刻本。85.熙朝定案不分卷，清抄本。86.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拓本一张。87.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清抄本。其他，圣诗音乐一，为：乐法启蒙，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新街拜堂藏板。地理类著作五，为：1.地理新志不分卷，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2.世界地图一幅，耶稣会士毕方济绘制。3.坤舆万国全图一幅，耶稣会士利玛窦绘制。4.坤舆图说二卷，耶稣会士南怀仁编制。5.坤舆全图一幅，耶稣会士南怀仁绘制。天文学著作二，为：1.诸仪象弁言，耶稣会士南怀仁撰。2.黄道总星图，四幅，耶稣会士戴进贤编制。数学著作一，为：1.几何原本十五卷首一卷，清同治四年（1865）刻本。植物学著作一，为：1.植物学八卷，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报刊一，为：遐迩贯珍，一册，清咸丰五年（1855）香港英华书院印本。

**二、俄国图所藏稀见天主教文献述要**

天主教文献主要是由来华传教士编制、印行的，是宣传天主教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后来各国传教士等人重点搜集的文献。因此，此类文献在海外，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等，拥有丰富的馆藏，且不乏稀见之本。这些文献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海内外学者多有关注，著名学者王重民、向达于20世纪30年代赴欧期间，都曾将此类文献作为重点调查对象。据笔者核对俄国图所藏这些天主教文献，其中也有一些书颇有特色，像《天学集解》《乐法启蒙》为海内孤本，而《熙朝定案》《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存世也屈指可数，且这些书都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现将以上五部书的基本情况略作介绍如下。**1.天学集解九卷**索书号为：ОP,Дорн829，藏于俄国图手稿部。该书为目前已知传世孤本，据比利时学者杜鼎克考证，为清初学者刘凝所编。书为抄本，抄写工整，文中略有涂改之处。每半页9行20字，书：23.1厘米×16厘米。一函九册，分首集、道集、法集、法集、器集、后集，全。关于此书的发现，最早见于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记载，他在整理利玛窦的中国传记资料时，发现了杨廷筠为《绝缴同文记》所作一篇序。伯希和指出这篇序文收藏于名为《天学集解》的书中，该书现藏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公立图书馆（按，即俄国图）。其后，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曾专门给俄国图手稿部相关人士写信详询此事，并获取了缩微胶片，此书才渐为学界知晓。《天学集解》原书未署作者，前亦无序言，杜鼎克考证出该书的编者为清人刘凝。刘凝（1620—1715），江西南丰人，康熙十六年（1677）岁贡，清初有名的天主教徒。刘凝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就收有刘氏《石鼓文定本》《韵原表》《稽礼辨论》三部书。《天学集解》是一部收录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本的序跋合集，共汇编了284篇文献，其中有249篇的创作时间大约在1599—1679年间，涉及到116本西学著作。收录序跋的作者共有137人，包括中国士大夫115人，来华传教士22人。《天学集解》著录的序跋，特别是一些不见他处的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杜鼎克考察《天学集解》中约有33篇文字未见他处。李青《<天学集解>稀见文献整理研究》在前人基础上考定出30篇稀见文献，同时，将之标点整理，附于文末[2]。**2.乐法启蒙不分卷**索书号为：ОР.КИТ.Н.С2-351，藏在俄国图亚非文献部。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新街拜堂藏板。8行23字，无版心，无栏格。一册，欧式硬装。书的前几页由于装订的原因，有些文字嵌入订线之内，无法识读。前有书牌，内刻：“同治己巳孟秋，厦杜嘉¨¨，乐法启蒙，新街拜堂藏板。”（按：¨¨指破损。）新街拜堂为厦门著名的基督教堂。此书封面题为“乐法启蒙”，内部尚有《养心诗调》《七言诗调》二部书。据资料记载，这些都为苏格兰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1830—1877）的作品。因此，是书书牌破损之字，当有杜名之“德”字。杜嘉德1855年7月来到厦门，直到1877年在厦门去世。二十多年，他主要在闽南地区开展传教活动。为了达到传教效果，极具语言天赋的杜嘉德通过学习，精通多种闽南方言，并编纂出版有《厦英大辞典》，该辞典至今仍是研究厦门语言与英语对应关系的重要参考。利用音乐，主要是唱赞美诗来达到劝人皈依基督的传教方式，能把枯燥的教义变得生动，特别对知识水平有限的普通百姓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包括杜嘉德在内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多对编辑赞美诗集极为上心。在圣诗编辑上，杜嘉德在厦门先后出版了《养心诗调》《乐法启蒙》《乐理颇晰》《西国乐法》，为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出版的最早、最系统的音乐教材。学界目前主要是根据这些作品，研究杜嘉德乐理理论及早期基督教音乐的特色。目前学者所见的只有《养心诗调》《乐理颇晰》《西国乐法》三部作品，而《乐法启蒙》一直难以寻觅。牛津大学饱蠹楼（Bodleian）图书馆藏有丰富地中文基督教文献，其中就有杜嘉德的音乐著作三种《养心诗调》《乐理颇晰》《西国乐法》（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是以饱蠹楼藏本或复印本为根据），但“《乐法启蒙》却不在其收藏中之中”[3]。可知此书极为稀见，学者只能根据当时《教务杂志》刊登有关《乐法启蒙》一些片言只语等有限信息，对此书内容进行推测[4]。可见，俄国图亚非文献部所藏的《乐法启蒙》是目前已知的一部孤本。俄图亚非文献部所藏杜氏《乐法启蒙》是与《养心诗调》合订在一起，与之相似的是，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所藏的杜氏三部作品也是合订在一起，笼统地归在《乐理颇晰》名下[5]。从这可知，这种装订非后人所为，说明杜氏诸书在内容上的密切联系。《养心诗调》前人多有论述，该书由乐理介绍和谱例两部分组成。乐理介绍部分包括“养心诗调叙”和“续叙”。据核对，俄国图亚非文献部所藏此书中《养心诗调》只有“养心诗调叙”。叙文介绍了《养心诗调》所作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教徒不熟音调，吟咏圣诗，往往出现“声音謱，高低杂出，纷然难听”问题。杜氏介绍大调自然音阶七个音的唱名，采用其独创的“一、二、三、ㄨ、〥、丄、七”来表示七个音级，并用“三层梯式”表示音阶的三个八度。同时，他指出每一级音表现不同的表情色彩，“七音之异，乃非徒然，各有意义在焉，如一、三、五皆欢然毅然之意。惟五为最嘹亮之声，六含重忧之意，七藏感激之意，四怀敬畏之意，二则有深思冀望之意，假如一换七，抑四换三，非第次纷乱于调，且亦淡然无趣”。“养心诗调叙”的后半部分详细解释书前所列39首乐曲（瑞士、悔改等）中的节奏和常用的节拍、小节线、节拍的长短、音节的轻重等基本乐理。圣诗谱例部分，“杜嘉德将《养心诗调》中的赞美诗以每句字数的多少分为‘七言诗调’‘八言诗调’‘八六言诗调’（即全曲四句，第一、第三句八个音节，第二、第四句六个音节）、‘六六八六言诗调’（即全曲四句，第一、二、四句六个音节，第三句八个音节及‘别样诗调’等类）”[6]。附录39首没有诗词的阶梯谱圣诗音乐，每一首都有调名，其中，七言诗调有瑞士、悔改、亚该亚、汉口、泰山、泉州、良心、日耳曼、路加；八言诗调有汕头、天下、希伯伦、天使、马可、晚诗、福日、巴比伦；八六言诗调有巴拿马、干证、上海、厦门、士提反、马其顿、大利、认罪、仑屯；六六八六言诗调有石马、天神、漳州、多马、新街、米加勒；六八言诗调有禧年、约翰、便雅悯；六四六七言诗调有天堂；七六言诗调有传道、天光；八八八六言诗调有求恩。这些名字，有的是圣城，有的是圣经中的人物，有的是宗教术语，也有中国的地名等。杜氏采用了中西合璧的“主音嗖乏（Tonic Sol-fa）”记谱法，“为了易于分辨三个声部的主次关系，他特意用黑字写旋律，用红色记中低音声部”[7]。《乐法启蒙》由两部分组成，即“乐法启蒙叙”和六十九首谱例。“乐法启蒙叙”，首先介绍了作是书的目的为“俾知乐人以次第教厥未学者，使其由浅而入深”。具体到此书而言，也就是指导乐师如何让初学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熟练掌握书中的六十九首谱例。学习这些谱例的最基本原则是“罔论何号，皆宜学熟，则可教其次。切不可躐等，致于无成”。在叙文中，杜氏主要阐述以下几点学习六十九首谱例的方法：一是，杜氏根据音阶难度，分为几个层次。其中，第1至16号，“只用一、三、〥，乃乐音至要，而最易最明者”。第17号以后，学二字之音。二是，根据半音的有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自首至三十一，惟一、二、三、〥、丄皆华人易学而易吟者”，第二部分“三十二以下有半音，非惟闽人所难吟，窃于华中人，亦鲜能吟者”。在半音部分，杜氏详细分析了半音ㄨ与七的难易与差别，又可分为第32至41号、第42至47号、第48至59号、第59号四个不同的等级。三是，教生徒之法，根据数量多少可分为两种方法，“生徒少者，则用一镌本教之；生徒多者，宜以大字抄如联幅。其格之长短，竖之大小，尤宜依法均配合式，并诸梯氏及正调，亦皆宜细誊分明，以便于指教”。四是，有些谱例前有“和”字，如第二十一号、五十一号等，意思是该曲可以多人合唱，并指明如何施行。五是，教授乐谱，音律高低、长短、急缓都要熟悉。如“欲明急缓者，或以手高举下垂，或挥旋左右，或以器扣案，或用绳悬石，使其旋动左右。三四法中，惟悬绳为最准，亦宜用拐以指于图，俾众齐声以吟”。至于六十九谱例具体构成，尚待学者专门研究。**3.熙朝定案不分卷**索书号为：ОP,Дорн726，藏于俄国图手稿部。耶稣会士南怀仁编。抄本，10行20字，书高宽：27.7厘米×23.7厘米。三册。第一册，共76页。封皮、是册首页首行题：“世祖章皇帝上谕。”内容首为顺治谕旨二，与耶稣会士有关，其一为顺治十四年二月褒奖汤若望历法精微准确。第四页起为“熙朝定案”，首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末题“康熙十一年九月日奉旨依议”。第二册，共59页，封皮题签、首页首行题：“熙朝定案。”首次出现时间：“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册末时间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日躔鹑首之次，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南怀仁谨述。”第三册，共54页，封皮书签：“熙朝定案。”首出现时间为：“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奏……”末有时间：“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著录此书，言：“《熙朝定案》，南怀仁辑。共三本，汇集康熙七年起至四十四年止，关于杨光先兴起之历狱、历法、造炮等等教士之奏疏，及皇上之谕旨。此书在历史上，有价值之文案汇编。”[8]笔者以中华书局整理本《熙朝定案》进行比较，其中，第一册中首“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为整理本《熙朝定案》所收第一个谕旨，即《上谕诸臣详定历法并谕遣诸大臣测验日影及内院礼部回奏始末》。末“康熙十一年九月日奉旨依议”，为整理本《熙朝定案》所收第43号奏议《刑部为历典之颁行等事议复二疏（二疏议复俱将杨燝南杖一百徒三年）》[9]。第二册首“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为整理本《熙朝定案》第44号《钦天监监正为请旨事一疏（题西儒恩理格请假给文往晋）》。末“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为整理本《熙朝定案》中“恭纪验炮·纶音盛典”部分[10]。第三册首“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奏”，为整理本《熙朝定案》中“恭纪验炮·纶音盛典”部分[11]。末“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为整理本《熙朝定案》康熙年部分之末[12]。由此可知，抄本在内容基本完整。据整理本《熙朝定案》序言可知，现存《熙朝定案》多见于海外图书馆收藏，有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等，这些藏本在内容上都不完备。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抄本，为目前所知内容完备、排列明晰最优的本子。“此书共三卷，是现存各本中收录最全的一种，年代编排也最合理，其中有的内容为他本所无”[13]，因而，点校者即以此本为主要底本进行整理。同时，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言此书为三卷本，正与徐家汇藏书楼藏本同，故知徐氏当见过此书。而此俄图手稿部所藏，亦正符合三卷之分，且内容完备，年代编排也秩然有序。更为相似的是，此书卷一首为顺治十四年“圣祖章皇帝上谕”一节。这些特征与徐家汇藏书楼藏本“标明三卷，除两份文件属于顺治时代之外，其余都属于康熙时代，起自康熙七年，止于四十四年”[14]，十分一致。因此可以推断，此抄本应和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抄本当为同一系统，具有较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另外，俄国图手稿部尚藏有一册刻本《熙朝特典》（索书号：ОP,Дорн818），9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镌“熙朝特典”。板框高宽：19.4厘米×27.5厘米，书：24.2厘米×15.5厘米。前有封皮题字：“熙朝特典。”上有基督教圆形印记。该册包括三部分内容（1）版心下镌“济宁州”，1—2页，是册首页即开始：“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十五日，圣驾至山东济南府，早晨，远西修士柯若瑟乘马出城十里，跪迎道左……”（2）版心下不镌字，1—6页。首页有：“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辰时，圣驾南巡幸杭州，殷铎特雇小船，恭持手本，迎至黄金桥。”（3）版心下镌“江宁”，1—6页。首页有字“康熙二十八年春正月，圣驾南巡渡镇江，往杭州会稽祭……”。这些记载俱见于《熙朝定案》。据整理本《熙朝定案》序：“康熙南巡的活动也是书中的重点。六次南巡，康熙均亲自接见传教士，为了宣扬朝廷对天主教的支持，传教士和教徒把接见时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熙朝定案》记载了其中的五次，包括1684年（济南、金陵）、1689年（济南、杭州、江宁、济宁）、1699年（杭州）、1703年（杭州）、1705年（杭州），关于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钦命传教约述》。”[15]经核对，可知《熙朝特典》所载，属于《熙朝定案》中康熙南巡1689年中的一部分，内容相同[16]。又据整理本《熙朝定案》前序言可知，罗马耶稣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处藏有多部不同版本的《熙朝定案》，“有许多是事发之后随时刻印的，是最初的刻本（偶有误字），刻成后即被装订成一薄册，寄回罗马耶稣会总部，如《新旨颁行》《纶音叠锡》《纶音特典》等均属这一类”[17]。这是该书版本较多、内容有异的重要原因。此《熙朝特典》仅有十四页，当即此种情况。**4.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索书号为：ОP,Дорн700，藏于俄国图手稿部。9行19字，单板印刷，版心无文字，无栏格。四周双边，单板，高宽：14厘米×9.4厘米，书：15.8厘米×12.4厘米。上计页码：三百乙十六页（指筒子叶）。牛皮纸，字典形式包装。前有书牌，下半部缺失，仅可见部分内容：“山答罗曰此世绝无余事物可以欣吾心，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实道居律氏记号。”“山厨罗明敖多麻氏新刊格物便览，西士一千七年七。”书牌中有个黑十字架，框的周围为花纹装饰。次“巴礼哆妈氏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序”。次目录。次正文。《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刊刻于1607年，为明万历二十五年，刊刻的地点在菲律宾，为目前已知的菲律宾早期四部中文刻本之一。《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最早由方豪于1957年发现于荷兰莱顿汉学院，为一残本，缺最前十页。他根据书中内容，断定此书为1606年撰著[18]。后期，学者又发现梵蒂冈耶稣会档案室、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全本。戚志芬在《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一文中著录此书，言：“此书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藏有一个残本，而梵蒂冈的耶稣会档案室则藏有一个完整的本子。由扉页确定书名为《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印刷时间是1607年7月，作者是‘山厨罗明教多麻氏’，即多明尼各教会的多麻氏·马约尔。这是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的中文译本。全书316页，有序文和目录。所用文字多与《基督教义》中文本同。……这本书也是刻于宾诺陀克华人教徒彼得罗·德·维拉之家的。”[19]文章所言页数与俄图手稿部所藏相同。又张西平《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以<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根据手中获取的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复制品，对此书做了进一步探讨。文中对维也纳国图藏本的描述为：“首页是西班牙文……书封中央为明道会的会徽……这本书共216页，后附3页当代西班牙文信件。书中每页9行，每行18字，四周双栏。从字体上看有两个刻工，全书的单页是一种字体，双页是一种字体，为便于刻书，书中多有简化字体。”[20]页数等项与俄国图手稿部、梵蒂冈耶稣会档案室所藏不同（按：又或此216页，或系316之讹）。此书内容，据张西平先生文章介绍，第一卷是“事理”，作者介绍了天主教的5件事理，作者从人兽之别讲起，先说明人和兽的不同，接着讲人的特点。第二卷是“解始祖人元历代鉴记”，这一卷实际上是对《旧约》和《新约》的粗略介绍，前面几节分别介绍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等内容，将《旧约》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按照中国纪年的形式很简单的勾勒出了一个天主教的纪年大事记。第三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向中国的华侨介绍天主教的“十诫”，由于“十诫”通俗易懂，易和中国伦理相接，作者在讲解时开始和中国文化逐步相接；这一卷的第二部分，直接就是比较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别、之通，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做了批评。又，此书宗教术语是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但翻译成中文时又用的是闽南话，从而造成了语言阅读障碍。书中首页“山答罗曰此世绝无余事物可以欣吾心，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实道居律氏记号而已”，据张西平先生根据对应词汇转换，译为：“保罗说，世上没有任何可以宽心之事，唯有吾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标志而已。”张文中亦过录有此书部分序文，可参考。《新刊格物穷礼便览》等中文刻本，是华人在菲律宾开创印刷事业的历史见证，在中外印刷史、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俄国图手稿部所藏该书为继荷兰莱顿汉学院、梵蒂冈耶稣会档案室、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三处已知第四部书，文献价值自不待言。**5.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题名据封皮所题。索书号为：ОP,Дорн831，藏于俄国图手稿部。抄本，书高宽：30厘米×16.9厘米。一册，八页。正文有卡缅斯基俄文翻译。首页首行题“历法格物穷理书目”，末有：“极西耶稣会士同著述。”又有“天主圣教书目”，末有：“极西耶稣会士同著述。”内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历法格物穷理书目”，一页8行，每行抄写2个书目，共89部，包括《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西学治平》《简平仪》一卷、《地震解》一卷、《日躔考昼夜刻分》《泰西水法》六卷、《测食略》二卷、《西学凡》一卷、《历引》一卷、《进呈鹰论》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仪象志》十四卷、《简平规总星图》《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恒星历指》《字考》一卷、《大测》二卷、《仪象图》二卷、《学历小辩》一卷、《圜容较义》一卷、《筹算》一卷、《恒星出没》二卷、《坤舆全图》《西洋测日历》《性学觕述》一卷、《测量法义》《逑友篇》一卷、《测验纪略》一卷、《西儒耳目资》三卷、《乾坤体义》三卷、《熙朝定案》二卷、《新历晓或》一卷、《交友论》一卷、《历法不得已辩》一卷、《奏疏》四卷、《寰有诠》六卷、《远镜说》一卷、《职方外纪》二卷、《浑天仪说》五卷、《坤舆图说》二卷、《五纬表》十卷、《况义》一卷、《恒星表》五卷、《辩揭》《正球升度表》《天问略》一卷、《五纬历指》九卷、《西国记法》一卷、《月离历指》四卷、《利玛窦行略》《表度说》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共译各图八线表》一卷、《古今交食考》《比例规解》一卷、《月离表》四卷、《空际格致》一卷、《新法历指》一卷、《西方答问》二卷、《勾股义》《奇器图说》三卷、《测量全义》十卷、《西学修身》十卷、《新法表异》二卷、《斐录汇答》二卷、《几何原本》六卷、《验气说》一卷、《天星全图》《西字奇迹》《西学齐家》五卷、《杨淇园行略》《励学古言》一卷、《黄赤正球》一卷、《譬学》一卷、《日躔历指》《画答》一卷、《交食表》九卷、《张弥克遗迹》《黄赤距度表》《赤道南北星图》《日躔表》二卷、《童幼教育》二卷、《交食历指》七卷、《名理探》十卷、《历法西传》一卷、《人身说概》二卷、《几何要法》四卷、《睡答》一卷、《狮子说》一卷。第二部分“天主圣教书目”共122部，包括有：《十诫劝论》一卷、《昭祀经典》《三山论学》一卷、《庞子遗诠》《圣教源流》一卷、《灵魂》《真福训诠》一卷、《圣体规仪》《善生福终正路》一卷、《圣体要理》《原染亏益》二卷、《周岁主保》《不得已辨》一卷、《圣教约言》《辟妄》一卷、《鹗鸾不并立》一卷、《正教约征》一卷、《司铎课典》一部、《五十言》一卷、《教要解略》二卷、《经要直指》一卷、《首人受造》四卷、《四末真论》一卷、《圣人行实》七卷、《求说》一卷、《圣体答疑》《告解原义》一卷、《天神魔鬼说》《七克》七卷、《圣教简要》一卷、《未来辨》一卷、《辩镜录》一卷、《真福直指》二卷、《司铎典要》二卷、《答客问》《超性学要》（目录四卷）、《圣教要理》一卷、《天主降生》六卷、《照迷镜》一卷、《圣若瑟行实》一卷、《周岁警言》一卷、《弥撒祭义》二卷、《避罪指南》一卷、《性灵诣主》《圣梦歌》一卷、《百问答》一卷、《耶稣会例》《熙朝崇正集》四卷、《圣教略说》一卷、《圣经直解》十四卷、《拯民略说》一卷、《天主性体》六卷、《四末论》四卷、《复活论》二卷、《景教碑诠》一卷、《圣依纳爵行实》一卷、《人类原始》一卷、《圣教实录》一卷、《涤罪正规》一卷、《主制群征》二卷、《助善终引》《提正编》六卷、《天主经解》一卷、《三位一体》三卷、《辨学遗牍》一卷、《降生引义》一卷、《天神会课》一卷、《圣方济各沙勿略》一卷、《灵言蠡勺》一卷、《教要序论》一卷、《悔罪要指》一卷、《灵魂道体说》一卷、《推历年瞻礼法》一卷、《主教缘起》五卷、《二十五言》一卷、《寰宇始末》二卷、《圣母经解》一卷、《同善说》一卷、《万物原始》一卷、《天主实义》一卷、《灵性理证》一卷、《圣玻而日亚行实》一卷、《性灵篇》一卷、《进呈书像》一卷、《哀矜行诠》二卷、《畸人十篇》二卷、《死说》一卷、《天学略义》一卷、《则圣十篇》一卷、《圣教问答》一卷、《七圣事礼典》一卷、《圣像略说》一卷、《天神》五卷、《轻世金书》二卷、《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八卷、《圣若撒法行实》一卷、《十五端图像》一卷、《出像经解》一卷、《斋克》二卷、《主教要旨》一卷、《永年瞻礼单》一卷、《蒙引》一卷、《十慰》一卷、《圣教撮言》一卷、《十诫直诠》一卷、《四字经》一卷、《形物之造》一卷、《天释明辨》一卷、《圣母行实》三卷、《天阶》一卷、《周岁圣人行略》《实义续篇》一卷、《默想规矩》一卷、《万物真原》一卷、《日课经》三卷、《启蒙》一卷、《身后篇》二卷、《圣教要理》一卷、《崇正必辨》二卷、《口铎日抄》三卷、《问世编》一卷、《圣记百言》一卷。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明末清初之士，大多数为来华的传教士。张西平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中文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言：“康熙间入华的耶稣会士也十分重视对他们这批中文文献的收藏和整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中文书中有两份文献专门记载了这批书目。这份文献上有两个书目，《天主圣教书目》（笔者按，文章此处注文为：此文献是单页雕版印刷，长宽为：59厘米×117厘米，页上有……，页下有‘极西耶稣会士同著述’。）和《历法格物穷理书目》，前者居上，后者居下。在书目前有一个‘引’。”[21]文后开列两个书目所载文献目录，经比对，与俄国图所藏内容相同，唯梵蒂冈图书馆藏本多一引文，且为刻本。同时，张文中指出清初入华的传教士叶尊孝（1648—1704）在其著作抄本《字汇拉定略解》（汉字西译）末附有六个书目，其中《北京刊行圣教书目》与《天主圣教书目》所载基本相同，《历法格物穷理书目》则书名、内容完全相同。从此可见此书目的流传及其重要性。

**三、小结**
俄国图所藏的天主教文献绝大数书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个人捐赠，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卡缅斯基。卡缅斯基（Kamenskiy P.I.，1765—1845）先后两次去过中国，他曾为第八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1794—1807）团员，后来担任第十届驻北京传道团（1821—1830）的团长。二十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培养了卡缅斯基深厚的汉学修养，同时也为他购买有关中国的书籍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第二次在北京期间，他购买了大量的图书。卡缅斯基与俄国图颇有渊源，他本人与当时的奥列宁馆长私交甚厚，后者在得知卡缅斯基将要再次去北京时，“就请负责宗教问题及民间教育问题的国家政府部长高利钦A.N.（Golitsin A.N.，1773—1844）允许自己通过卡缅斯基为图书馆在中国购买书籍”。卡缅斯基也曾多次将自己的图书资料捐赠给图书馆，“1819年，卡缅斯基P.I.将自己从满文与中文翻译成俄文的几部书捐赠”。“1832年，卡缅斯基从中国回来以后把自己收藏的满、汉、蒙等文的一些书籍捐给了图书馆。”[22]1832年卡缅斯基所捐赠的书目录详细记载在了他的日记上，后来被整理成《1832年捐给帝国公共图书馆的满汉书籍书目》。1919年，圣彼得堡神学院讲一部分藏书转给俄国图，其中也包括卡缅斯基的14部藏书。俄国图所藏的天主教文献，明确可知为卡缅斯基所藏有十八部之多，基本上是卡缅斯基第二次中国之行所购。这些书上面多有他的识语、批语。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列举稀见文献《天学集解》《熙朝定案》《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三部书皆是卡缅斯基所藏。《天学集解》函套上有卡缅斯基的记载：“罗马教传教士出版书的书目，抄本，9册，1套。”还有他1827年赠书的识语。每册后面有卡缅斯基核对的记载，在第六册末页知记载是1824年写的。《熙朝定案》每册封面内部都有卡缅斯基的识语，第一册第一页的记载写于1828年5月9日。《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末页有卡缅斯基识语：“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的书目，彼得神父编，1831年。我很荣幸将此书赠给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尊敬的馆长。”彼得神父即卡缅斯基。正文有卡缅斯基的俄文拼写，即当时卡氏识语中所言的编纂之意。这些珍稀的天主教文献，为这位在中俄交流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又增添了光辉一笔。

**附书影四幅：**



《天学集解》



 《乐法启蒙》



《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



 《天主圣教诸书经典名》

**参考文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圣彼得堡大学馆藏汉籍专题研究（项目号：19CTQ014）”成果之一。

[1]〔俄〕雅洪托夫：《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中文抄本与木刻本目录文》，圣彼得堡，1993年。[2]李青：《<天学集解>稀见文献整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3][5][6][7]宫宏宇：《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所藏十九世纪中国音乐教材述略》，《音乐探索》，2017第4期，第17—18页。[4]宫宏宇：《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第31页。[8]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287页。[9][10][11][12][13][14][15][16][17]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99、140、148、193、序言11—12、序言12、序言5、171—174、序言9-10页。[18]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521页。[19]戚志芬：《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文献》1988年12月，第262—263页。[20]张西平：《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以<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第77页。[21]张西平：《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中文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国际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第327页。[22]〔俄〕雅洪托夫撰，〔俄〕马义德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中文抄本与木刻本目录·序文》，《汉籍与汉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期，第36—37页。

**【作者简介】**张云，1987年生，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文献学。

马义德（Maiatckii Dmitri），1982年生，俄罗斯人，文学博士，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俄罗斯汉学史。